

1995年3月25日,巴金在上海带病主持了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巴金是医院“特批”出来的,当他吃力地嚅动嘴唇宣布开会时,不远处,有一位老人掩面泣泣起来。他便是小巴金一岁的黄源。他也是听说巴金要亲自主持会议,经医院“特批”,以90岁高龄从杭州赶来的。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感情,在此不久前,他曾在病房对我说过:“当年给鲁迅先生抬棺材的,就剩……我和巴金了……”

鲁迅晚年亲密相知的学生

真正开始理解他是参与操办老人的祝寿活动。在他90华诞前,李小林向我约稿,说巴金交代在《收获》的专栏,发黄源和一位作家的文章。

黄源家居葛岭已悠悠三十余年。可是,几年前的一场重病,让他成了医院的常客。如今,老人是为我的采访特意回来的。

黄源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出生在一个普通且清贫的教师之家,祖父当过小学校长,父亲终身为小学教员。而父辈对他的最大期望,无非是早日读完师范再回家当小学教员。但少年的他,自从迷上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就做起了文学梦,从爱读新小说到



左起:黄源、萧军、萧红

选择有文学名家为师的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院求学;从日本自学外语结识茅盾,到为他编《文学月刊》,到后来由茅盾推荐给鲁迅编《译文》。他有了幸成了鲁迅晚年亲密相知的学生,一个能经常为鲁迅办事并上门聆听教诲的学生和事务助手。

他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1927年的劳动大学,学校安排他为鲁迅演讲做记录。而认识先生是1931年,鲁迅因喜欢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土敏土》,特地介绍给新生命书店再版。担任特约编辑的黄源,见先生很重视这部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译作,先是亲手翻译戈庚的代序,又安排复制木刻作插图,并关照由他自己校订书稿。黄源为此多次往返内山书店,从取送校样,到出版后送上十册样书及稿费,以一份勤勉之心,给先生留下最初的好感。而真正进入鲁迅的朋友圈,以及他的私人空间,还是茅盾介绍他为鲁迅编

黄源:在鲁迅身边

·陈军·

《译文》杂志。

“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

接手《译文》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终于像个学生,能经常面对先生的教诲,感受那种亲切的人间少有的深刻和幽默的语调,整个人一下子幸福得晕眩起来。

鲁迅对这份杂志看得很重,反复叮嘱黄源:“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见黄源因紧张有些惘然,又宽慰他说,前三期黄源做助手,由自己来编。黄源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934年8月5日,在茅盾寓所见先生编完创刊号的情景:

天气炎热,鲁迅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他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稿子和插图的画册本,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目用几号字体,插图大小,都已一一注明,自前言到后记,几乎一切都已编排妥当。

8月14日,黄源收到鲁迅给他的第一封信,开始领略先生办刊的机警和诙谐:“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

‘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一点的好。”

鲁迅曾对茅盾说起办《译文》的初衷,他想纠正人们轻视翻译的眼光,提一提翻译的身价。面对当时的检查制度,鲁迅建议自己和茅盾、黎烈文都不署名,杂志对外主编署名黄源,实际主编由他来做。

住在亭子间的黄源,从此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跟随鲁迅,几乎用全部精力集编务、校对、印刷、办事员于一身。编完三期后,鲁迅满意地对他说:“下期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

他不能讲鲁迅的死

年轻时,黄源不但好文艺,好读书,好交游,还好宣泄。有时从先生家里出来,还总要去胡风、巴金、萧军和萧红处谈谈,有时还会泡个通宵。正像他描述的,在认识先生前,他只是个非常淳朴稚嫩的文学青年。如果没有鲁迅,如果让他单独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个复杂无秩的文坛,他可能会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胆

怯和迷茫。可能会在一种突发的事件和误解下,露出带点神经质的呻吟和哭泣。正如后来发生的“倒黄事件”,面对生活书店的名流以请鲁迅吃饭名义要他辞职。鲁迅愤而离席,直斥这是“吃讲茶”的做派。而当徐懋庸给先生写信,污蔑胡风、黄源和巴金时,又是鲁迅在病床上挺身而出,写下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三人申辩。他感叹地告诉我:“为了防后方,鲁迅当时只能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吃力。”

鲁迅的晚年常常孤军作战,一代文豪的文学生命和生活热情就这样被消耗殆尽。

对于一些越来越久远的故事,黄源变得越来越动情了。他不能讲太沉重的话题,尤其不能讲鲁迅的死,他想起先生的遗容就会悲恸得热泪盈眶。他曾情不自禁地握住我的手说:“两天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就走了?他送我和萧军出来,还关照我去看看普希金的话剧呢……”

他怕讲这个沉重的话题,又忘不了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他说他赶到先生家握住先生手时还暖生生的。

(摘自《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第1期)

探访俞平伯

·周忠麟·

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有很多世纪老人,其中如夏衍、巴金、冰心、俞平伯等,都是在1900年出生的,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了。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应该抓紧时机,拜访这些世纪老人,为祖国留下珍贵的文学遗产。

早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拜读了俞平伯和朱自清各自撰写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知道了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等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鼻祖。之后,又喜欢上了俞平伯的散文名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1983年9月,我与俞平伯通信后,他在9月28日给我的明信片上说:

忠麟同志:来信转到。拙文芜杂,得失参半,乃蒙鉴赏,为幸。旧本零落并无新刊,难塞雅意。今年有新印三书,开列于下:1.俞平伯选集,他人所编,我未校对——上海文艺出版社。2.杂拌儿之一二,我看过。江西人民——百花丛刊内。3.依旧书重印,《我们的七月·六月》,系同人刊

物,我与朱君所作颇多,上海书店出版部。

你在上海找书不难,另有《论诗词曲杂著》,古籍出版社,云年底出书。匆匆奉复,即颂 著祺

俞平伯 九·二八 南沙沟十一楼一门二号”

1983年10月初,为了亲耳聆听俞老对散文的见解,我就当了名不速之客,拜访了尚在“沉睡”中的俞平伯。我去南沙沟拜见了俞平老,记得那已经是冬天了,我孤身驱车来到了南沙沟,到了二楼。因为我知道俞老已经谢绝接待一切来客,所以也不事先预约,径直闯入府上。俞老的女儿为我开了门,然后从漆黑的后屋请出了俞平老。只见俞老穿着一身黑色中式衣裤,慢慢地走了出来。甫一入座,我定睛一看,发觉他的衣服很新,但衣服上却布满了一个个小洞洞,可以说星罗棋布。小洞洞还特别明显,因为已经能看到洞里的白棉絮,形成了“满天星”。事后才知道,那是俞老吸烟的烟灰烧出的杰作。据说俞老嗜烟嗜肉,不受控制,吃完就睡,自然率性。

俞平老似不善言辞,那天他是睡眼惺忪,我也不便多说,只记得我说自

己在细读他的散文,日后请他指教,然后我把已经写就的《细腻绵密 文思郁勃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递给俞平老,请他指正。其他聊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10月20日,我收到了俞平老用我稿纸下半部空白部分裁下来后给我写的回信说:

来信、稿件均收到。我的文字本是随便书写,少有可取,原不值得介绍。承你逐爱,写为文字,且予以广播,为愧……我因久病,其他未能一一枝改,至歉。所询两点亦不能答复,以均不值得重提也。原件奉还,余不一一。

俞平老虽说“未能一一枝改”,但却在我的原稿上改动颇多,有的地方甚至有剪贴和加入过渡语句等字迹,煞是费心。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又整天沉湎于昆曲,俞平伯基本不会动笔去写文章了,所以人们看不到他的手迹了,而我却珍藏有俞老以上两封手书,他的字就如同火柴梗堆积起来一样,和他的言语一样——木讷、呆板。然而,让我惊奇的是,他早年的书法却是那样的精彩和灵动。

(摘自1月5日《新民晚报》)

谢冕:七嘴八舌才是北大

·林祁·

1990年代中期我从日本归来进入北大随谢冕老师读博。从北大毕业,一晃2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随谢冕老师读书和读诗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曾陪同谢老师去日本著名的东洋文库讲座,听谢老师为日本学者讲授中国文学史,体验谢老师那种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才情与气势,还记得谢老师在京都看见的“唐朝”,在奈良面对小鹿产生的生命悸动,还有谢老师在听我转述我的大学老师孙绍振讲述谢老师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时的表情,还有谢老师对生活的热情,还有对学生的批评与关爱……

其中,留在记忆最深处的,莫过于博士课程期间谢冕老师为我们开设的“批评家周末”。每到周末的下午,阳光总会敲响中文系五院古老的红门,“鸟鸣山更幽”,门的吱呀声使翠竹愈发郁郁葱葱。谢冕老师请来引发文坛争议的诗人或作家与我们座谈,让我们亲临文学现场,讨论每每唇枪舌剑,各擅胜场。不时参加我们讨论的洪子诚老师常常会来几句“冷幽默”,给激情如火的谢老师和我们这些谢门子弟降温。比如有一次他说谢老师就是喜欢“小女人散文”,讽刺谢老师的审美趣味,但洪老师讲这段时,故意省略“散文”两字,逗得谢老师哈哈大笑,众人前俯后仰,仰起再“战”。北大课堂的那种如同亲情般的让人如沐春风般的感受,让人终生难忘。

记得有一次“批评家周末”讨论的主题是当时极为流行的根据美国

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廊桥遗梦》,谢老师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洪子诚老师后来回忆说:“他的这个评价,可能和那时他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切忧虑有关,他把对这个文本的阅读,加入了对时代严重病症的思考。我对《廊桥》并无好感,觉得它是个俗套,我也从来不喜欢过分感伤的作品。但那时我不是正常地谈我的意见,而是故意往极端上去糟践它:那是在故意显示我与他的区别。谢冕不会不知道我的‘诡计’,但他没有表现愠怒,照样正常地引导着这个讨论。”于是我们的“批评家周末”有了两个导师,一冷一热,一唱一和,尖锐而又有趣,恰似谢冕所言:七嘴八舌才是北大。

谢老师总是鼓励我们“乱说”,有一次,我和沈奇把还没“档案”的于坚带到了我们的“批评家周末”。犹记得那个下午,我们在一起朗读于坚刚刚发表的那首《0档案》。

于坚的这部《0档案》发表于1994年,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引发了广泛争议。这种“后新诗潮”的出现对于中国新诗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新诗潮”的推动者与发言人,谢老师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以宽容与期待接纳了这种挑战。他始终避免从理念出发,而是直面诗歌本身,无论对“新诗潮”的把握,还是对“后新诗潮”的阐述,谢老师都是建基于对一首一首诗的精细的剖析。他谆谆告诫我们:“理解这个陌生的艺术世界是要花功夫的。”(摘自《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